

谈古论今

热历史

古人打假记

每年的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。说到“3·15”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不是脱口而出的“打假”。在古代，人们会不会也买到“货假价不实”的东西？遇到假货，他们会怎么处理？大家来看看古人打假那些事。

三千多年前古人就在打假了

早在3000多年以前，古人就有了“打假”意识。

自上古周朝，便已出现假货，并且泛滥程度严重到需要政府加以管制。据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“用器不中度，不粥于市；兵车不中度，不粥于市；布帛精粗不中度，幅度狭不中度，不粥于市；奸色乱正色，不粥于市。”

古汉语“粥”有“卖”的意思，这个规定说的是如果商家卖的器具、车辆、布帛等商品的质量、数量、品质、颜色不达标，就不准在市场上出售。

食品安全问题在古代也很受关注。唐朝对于食品安全有相当严格的法令条例，比如，食物变质致人生病或死亡的，商家的主要负责人要被关押进监狱，甚至被判处绞刑。

《唐律疏议》还规定，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，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，都可以找卖方退货；卖方不退的，可以向官府举报，由官府强制执行退货，并打卖方四十鞭子。

茶商以柿子树叶掺假 宋徽宗被气得“坐不住”

宋朝手工业、食品行业发达，工商贸易非常兴旺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次充好、以假乱真的现象，甚至连皇帝都被假货气得坐不住了。

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提到茶商造假，手段令人发指：“其有甚者，又至于采柿叶桴椹之萌，相杂而造，时虽与茶相类，点时隐隐如轻絮，泛然茶面，粟文不生……杂以卉莽，饮之成病。”

不知道这位皇帝是不是也喝到过这种掺假的茶叶？他以天子之尊，面对造假，可谓痛心疾首：不法茶商把柿子树叶、苦丁树叶掺进茶叶里，一起加工制作成真假难辨的茶砖，普通百姓看不出来，把这种茶喝下去，久而久之会喝出病来。

宋代也有“防伪码” 买双鞋子都能查真假

面对造假成风，宋代官府的态度倒是非常强硬，命令商人组成“行会”，按照不同行业登记造册，经营者必须入会，由会长作为担保人，严把质量关，如果发生行业内商品案件，担保人就负

有连带责任。

此外，宋朝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，对有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。比如，往牛肉、猪肉里注水，一经发现，就会被责打六十棍，造假商户若再次造假被抓，数罪并罚，将会被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宋朝时还出现了“防伪码”，要求商户自己发明“防伪”措施。宋朝公案传奇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中讲过一个故事：制鞋匠任一郎，在每双做好的鞋中都会放一张写有“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”之类字样的字条，并且特设一本“坐簿”，靴子里面的纸条与“坐簿”上是一样的，买家要想知道鞋子的真伪，来他的店铺一对照便知。

聪明如纪晓岚也屡买屡踩坑

明清时期，造假欺诈更是层出不穷，就连著名的才子纪晓岚，也屡屡上当。在他所写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，专门有一篇笔记，盘点了他从小到大的假货上栽过的跟头。

比如，他买到的号称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所制的墨，竟是用泥巴染成黑色的，还有一次买到的蜡烛点不着，一看居然是泥巴做的，仅在外面敷了一层羊脂。就连外焦里嫩的烤鸭也是泥巴做的，只不过是真在真的鸭骨、脚掌、头颈上塞上泥巴，又糊了一层烧烤颜色的纸仿作鸭皮，涂上油以假乱真。

收藏界响当当的乾隆买了赝品还“嘴硬”

假货层出不穷，甚至渗入了艺术界。收藏界响当当的人物乾隆皇帝，这不也看走了眼。

元代著名画作《富春山居图》(子明卷)于乾隆年间被征入宫，乾隆视之为至宝，天天将它带在身边，稍有兴致便在上面“发个弹幕”(乾隆爱好在画作上



▲信誉是金 (资料图)

题跋，此卷题跋多达55处)。

谁料没过多久，市场上又流出了一幅一模一样的《富春山居图》(无用师卷)。经过多方求证，乾隆惊知这幅才是真货，而自己之前爱不释手的竟是一幅仿冒品！好面子的他打死也不承认自己买到了假货，一口咬定新的这幅是“赝品”，同时又以高价买下“赝品”，并偷偷珍藏了起来。

为了治理愈演愈烈的假货风潮，清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，在一些政策的推动下，涌现出许多“编制内”的职业打假人，他们大多是当地政府主管财政的官员。

图书馆的经籍竟被篡改？石头上刻书应对“学术造假”

在古代，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，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。

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，涉及典籍的版本问题，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权威，于是互不相让。争论无果时，大家纷纷去找依据，结果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。不过，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的，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，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，于是兰台收藏的经籍被改得面目全非。

汉灵帝时，著名学者、书法家蔡邕实在看不下去，就向汉灵帝提出建议，组织权威学者，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，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，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。

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，命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。在蔡邕的主持下，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，校订出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《公羊传》七部儒家经典，共20.9万字，全文刻制在46块石碑上，每块碑石“高一丈许，广四尺”。

(《海峡都市报》)

古人通过植物找矿

王峰

所谓矿产资源，是指经过地质成矿作用，具有开发利用价值，或有用元素的含量达到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矿物。作为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，它们或埋藏于地下或出露于地表。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，再到后来的铁器时代、信息时代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，离不开对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。

对于这些深埋在地下的矿产资源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发现呢？“有一种找矿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并且即使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，该找矿方法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”据南京大学矿床学博士、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维民介绍，这就是植物找矿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中说“玉在山而草木润”，体现山中蕴藏矿物和周围植物生态相关的思想；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记载“山上有葱，下有银；山上有薤，下有金；山上有姜，下有铜锡”等，论述了作为矿床的指示植物和某些元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。“其理论比国外的植物探矿理论早了几百年，而这些植物便是矿产勘查领域中常说的‘指示植物’”。

古人很早就学会根据植物来找矿，并在这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规律。春秋时期的《管子·地数篇》、明代《天工开物》等都有相关记载。《管子·地数篇》载：“上有凡江者，下有黄金；上有慈石者，下有铜金；上有陵石者，下有铅、锡、赤铜；上有赭者，下有铁。”《天工开物》称：“金多出西南，取者穴山至十余丈……”

“矿产是在地球漫长、复杂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，植物能通过根系吸收来自土壤、岩石中的元素。”郭维民告诉记者，这意味着，植物成分可以反映地表以下一定深度的土壤、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，从而为寻找矿体提供成矿信息。

1951年，海州香薷是我国用科学方法正式发现的第一种找矿的指示植物，其发现者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。

据郭维民介绍，其时，谢学锦前往安徽安庆月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，发现在铜矿区这种野草开着紫色小花，生长茂盛；经鉴定后认为，这是一种“喜铜”植物，所以又称它为“铜草”。其根部含铜量最高达3%，一般也在1%左右，而生长着这种小草的土壤里也有极高的含铜量。海州香薷作为铜矿指示植物由此宣告发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谢学锦的父亲谢家荣是我国的矿床学巨匠，他发现了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，他曾在南京创办“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”，以应国家建设急需，快速培养一批地质人员。(《金陵晚报》)

古事汇

古人植树的N个理由

在中国，植树的历史可谓悠久。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呢？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

答案是：有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桑、枣等经济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充，为百姓的衣食生活提供保障。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，还能致富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那些有“千树枣”“千树栗”“千树橘”“千树萩”“千亩竹”的人，堪称“素封”。他们虽然没有朝廷的封爵，但是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。

行道树在中国历史悠久。早在两周时期就“列树以表道”，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。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，更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。秦朝时，大修驰道，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：“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，行道树种类增加，不仅限于松树，杨、柳、榆、槐皆有之。

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作为军事屏障。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例子。彼时，函谷关附近有茂密的森林，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，其关隘作用因此大大提升。秦汉以来，用树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作用更加明显。

当然，古人也早早有了环保的意识。孟子曾言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，《汉书》更指出“斩伐林木，无有时禁，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”，明确提出了水旱灾害与乱砍滥伐之间的联系。清代华州严格执行山禁，禁止砍伐林木，以减少水土流失；西乡县广种树木，防止水患……这些都说明，古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了。(《漯河日报》)